

传统兵学研究的精品之作

——《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评价

● 高润浩

中图分类号:E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3)02-0154-05

传统军事文化是一个值得研究但又研究得远远不够的领域。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事问题始终是关系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据统计，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共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六千多次。频繁的战争，培育了中国人发达的传统军事文化，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军事文化遗产。如何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实现新世纪中国军事文化的伟大复兴，这是每个军事理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军事文化研究如此重要，军事文化遗产如此丰富，军事文化复兴的要求如此迫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统军事文化研究却长期处于相对沉寂、近乎边缘化的尴尬状态。这与军事文化研究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与传统军事文化的丰富遗产极不相称，与军事文化研究的客观需求极不相称。从客观上讲，军事文化不尽人意的研究现状，确有其特殊的原因。军事文化研究对研究者有特殊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具有较深厚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又要具有较专业的军事学素养，二者缺一不可。地方学者常常因为缺乏必要的军事学训练，难以从军事的层面揭示传统兵学文化的精髓；而军队学者又往往因为历史学系统训练的不足，或囿于实用立场，无法以充足的史学论证来支持自己对兵学文化现象及其本质的体认。传统军事文化研究迫切需要一批既懂历史又通军事的复合型研究者。《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以下简称《刀剑》)的作者黄朴民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本书既是作者十几年军事研究的总结升华，也是他十几年军事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该书已于2002年10月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

通观《刀剑》全书，笔者认为本书主要有以下几点鲜明特色：

第一，强烈的学术报国意识 正确的治学态度，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很难想象，没有正确的学术态度会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军事史研究不是书斋里的

文字游戏,不是象牙塔里的冥思玄想,不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不是沽名钓誉的官样文章,那么,军事史研究的目的何在?作者在《刀剑》一书中,对军事史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有着平实而又深刻的阐述。

军事史虽然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但更是军事科学整个学科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它的基本宗旨仅仅是叙述总结以往的军事活动陈迹,提示军事历史上准备战争与实施战争的一般性规律,与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等直接服务于现实军事斗争需要的学科相比,似乎不怎么显赫与重要。尤其是在整个社会被急功近利心态与氛围所包围和充斥的今天,军事史研究更有意无意地被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可有可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悠久军事文化传统,不善于从以往的军事历史中借鉴得失、启迪成败,那么它就没有资格侈谈什么军事理论创新,也不能建树真正有价值的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更遑论在世界大变局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施展自己的影响了。一句话,不珍惜传统,肯定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漠视历史,迟早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作者对军事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还来自对西方中心主义者谬论的冷静思考。如美国人杰弗里·帕克在他那部全景式的战争史著作——《剑桥战争史》中,罗列了发生在欧洲、美洲、非洲、中亚、南亚、东北亚、太平洋、大西洋等地区的所有重大战争,却独独略去了曾经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帕克还毫不犹豫地断言:“独立的军事科学遗产始自希腊。”众所周知,中国有“兵学圣国”之美誉,春秋时期《孙子兵法》诞生之时,西方尚未有一部象样的军事著作。面对这种不公正的言论,单纯的义愤于事无补,简单的反驳也难以服人,正确的态度“还是径自讲述我们自己的军事历史,去让世界了解,世界自有公断。”

正是基于对军事史研究重要性的科学认识,基于对军事史研究的学术报国之志,作者“在军科工作十四年来,不管是身处顺境或暂遭挫折,对军事史的兴趣和投入都不敢有片刻的懈怠”,始终矢志不渝地投入于军事史的研究之中。

作者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学究式研究,对于学术如何为现实服务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刀剑》一书的序言中说:研究军事史的根本目的固然是出于服务现实的需要,但这个“服务”不是浅薄地从历史上找几例类似现象进行简单比附,既包括有针对性的古今沟通,更包括深层次的文化总结。他以西汉历史为例,贾谊的《过秦论》与《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等固然重要,但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何尝没有伟大价值?他说:

倘若我们撰著的《中国军事通史》在学术价值上全面超越中国台湾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和民众了解和研究中国军事历史的首选著作;假如我们撰著的《世界战争史》能打破帕克之辈《剑桥战争史》的西方中心观,客观全面反映世界军事发展的真实面貌,难道不同样是政治与思想文化斗争的胜利?不同样是为现实服务?

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胸怀祖国的爱国激情,成为作者从事军事史研究的不竭动力和思想源泉。《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经验和启示》、《历代军队改革的得

失与成败》、《传统国家安全战略鸟瞰》、《中国古代军事预测考述》、《春秋列国的兵要地理及其战略格局》、《战国地缘战略形势及其演变》等,无不显示着作者对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等现实重大战略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对春秋战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在统一问题上,作者在分析我国历代几次重要的统一事件的基础上,概括出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模式,认为凭借必要的武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是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根本途径。这一观点,有力地驳斥了一些学者忽视军队实力建设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过程中特殊地位和作用的片面认识。再如《历代军队改革的得失与成败》一文,在分析历史上军队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肯定了改革对于军队建设和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提出决定军队改革成败的关键不在军事,而是军事以外的因素,历史上军队改革的许多做法是与军队改革的基本宗旨相背离的。此文发表于军队改革如火如荼之际,在当时无疑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又如《传统国家安全战略鸟瞰》一文,对传统国家安全进行了宏观的总结与概括,提出致力于建立和维护封建大一统格局,是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保证;重视军队建设,加强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在总结传统国家战略经验做法的同时,也指出传统国家安全战略具有自大保守、人治传统、重道轻器等局限性。这些文章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无不体现了作者深沉的历史责任意识和学术报国情怀。

第二,思想史研究与军事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这是《刀剑》一书的基本特点。作者常说,他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史,一是军事史。思想史与军事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与思路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使作者在研究中常常面对一种两难选择的困惑。作者在秦汉思想史研究方面已有建树,如果深入下去,必有更大的成就,但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军事史研究,这使他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思想史研究中;另一方面,如果抛开思想史,专心于军事史研究,也许在军事研究上可以“更上一层楼”,但他所钟爱的思想史研究又让他难以割舍。古人云:“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正是这种思想史研究与军事史研究的两难选择,成了他从事传统军事文化研究的两个理论支点,使得他在研究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作者将思想史研究与军事史研究相结合,开创了军事史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实际上,史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并非自作者始。史学泰斗王国维先生,把考古学与史学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洋汉学结合起来;陈寅恪先生利用自己广泛的外文知识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诗证史,他们的研究启发了史学工作者的思路。《刀剑》一书借鉴和发扬了史学前輩的研究方法,将思想史研究与军事史研究相结合,对于军事文化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同样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思想史与军事史作为历史学的两个分支学科,在学科特征和研究方法上,有同有异。一般来说,思想史是历史学科的深层研究,通过对史料的去伪存真、去粗求精、由表及里的考察分析,揭示思想史各现象与事实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而军事史研究注重从军事学的角度,运用军事学的概念术语与相关理论对历史进行解读,旨在揭示战争与军事发展的规律,探索历史中的军事谋略与智慧。思想史与军事史作为两

种不同的历史研究视角,运用于军事文化研究中,其研究方法可以相互借鉴,其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启发。军事史研究将为思想史研究提供思想线索和资源,战争形态的发展、军事制度的演变以及作战指导思想的革新等,都可能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关键背景,使思想史研究更丰富、更生动;思想史研究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可为军事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大量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军事史特别是军事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认识,而且可以从思想文化的层面考察军事文化现象,为深化军事史的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与动力。

《刀剑》作者将思想史研究与军事史研究巧妙结合,灵活运用,通过对传统军事文化的主要成就、基本特征、历史地位以及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系统地勾画了以先秦至隋唐为重点的中国古典兵学的发展脉络,深刻揭示了传统兵学文化的内在价值和多重意义。本书虽名曰“散论”,实际上却具有内在完整的体系性:总论部分就传统军事文化的核心内容展开阐释,在历史的纵向坐标上,为古代兵学文化的发展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轨迹。分论部分,作者从历时与共时、历史与军事、思想与文化等多个不同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古典兵学的演进轨迹、地域特征、文化背景,并以《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三略》、《李卫公问对》等著名兵书为对象,总结了中国兵学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学术内涵、文化特征、历史影响;既有对军事文化重大问题的宏观考察,又有对兵学典籍的细致阐释,还有对传统兵学影响深远的诸子军事思想的精到分析,较完整地再现了传统军事文化的全貌,使中国古典兵学的绚丽风姿充分展示于世人眼前。

第三,重视揭示军事现象的文化义蕴,善于从哲理的高度反思中国兵学文化的利弊得失 《刀剑》一书虽然以军事历史、军事思想为具体研究对象,但作者在诠释历史现象时,始终能以哲学思辨的张力关注史实本身所涵蕴的深层内涵,这正是本书既有别于一般思想史著作又有别于一般军事史论著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一特色在本书第二部分与第五部分诸篇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例如,《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异同比较》、《齐鲁兵学的文化特征与历史地位》、《学术兼容与兵儒合流》、《汉武帝时期的战争与两汉社会思潮走向》以及《儒家战争理念与传统军事文化》等有关儒、墨、道、法等诸子军事思想的篇章,都体现了作者对传统军事文化深入探索的不懈努力与可喜尝试。

在《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异同比较》中,作者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异同分合及其嬗递演变的轨迹进行考察,分析了战国后期诸子之学对当时兵学发展的影响。又如,《汉武帝时期的战争与两汉社会思潮走向》一文,在讨论西汉后期兵学思潮主题的变化时,从汉武帝时期的战争导致严重后果这一角度切入,论证了这种转变的不可逆转变。再如,作者还从道德与功利关系入手,分析了墨家军事思想之所以沉潜不彰的根源,指出“墨家在道德、功利之间处心积虑寻找平衡的结果,是既丧失了道德上的崇尚纯洁性,又制约了功利上的现实可行性”,最终导致其学说的中衰,等等。这些研究均超越了单纯史实梳理的层面,而真正进入了文化阐释学的境界,从而大大强化了全书的理论思维力量,给读者提供了更大的思索空间。

第四，务去陈言的创新意识 学术的生命力贵在创新，换言之，不囿成说、自出机杼是衡量一部学术专著是否富有价值或价值大小的主要标志。作者在本书序言中说：“我相信片面或局部的深刻要远远胜于整体或全面的平庸，与其面面俱到、了无新意，不如个别深入、悠然会心。”通观《刀剑》全书，对众多兵学文化现象作出了独特的诠释，新义迭呈，富有创见。这既体现于其对一些宏观命题的开闢论说，也反映于其对微观细节的精审考辨。务去陈言，力求从文化意蕴的索隐发微上做出不懈的努力，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本书的创新之处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言前人所未言。如在《先秦兵学发展的概况及其特征》一文中，作者将先秦兵学的演进历程概括总结为四个基本阶段：即以甲骨卜辞、《周易》为代表的前理性时期，以古代王者司马法为载体的“军礼”时期，以《孙子》诞生为标志的“兵法”成熟期，以《六韬》面世为象征的综合融汇时期。这显然是言之成理的独到见解，也为军事思想界的同仁所折服。又如《秦汉兵学的建树》一文，勾划了秦汉兵学的基本发展轨迹，分析了当时兵学发展中的几个重要环节，至于秦汉兵学“大一统”的时代特征、兵学旨趣以“取天下”向“定天下”转变、“兵学主题的转换与兵儒合流的发轫”等观点，皆属言前人所未言之论。

二是运用新的理论或方法。如《春秋列国的兵要地理及其战略格局》和《战国地缘战略形势及其演变》，运用地缘战略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地缘战略态势，揭示其所处的地缘环境与其战略动态、发展前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认识当时的战略格局及其演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当今的国际合作与斗争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三是纠正前人成见，另立新说。如《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平议》在分析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批驳了过分夸大和完全否定这一思想的两种错误观点，在肯定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重大理论价值的同时，论述了这一思想在传统兵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正确评价了它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又如《“伐交”本义考证》一文，对孙子兵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伐交”的本义进行了考证，否定了当前通行的解释，认为伐交是进行外交斗争瓦解敌方联盟、巩固己方联盟，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孤立敌方，迫其屈服。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宋本孙子十一家注》的大部分注家都将“伐交”解释为“以外交手段胜敌”，当代学者也都持这种观点。作者通过对“交”与“伐交”字义的文字学考证、对春秋时期军事斗争的形式与特点的考察，以及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的分析，提出孙子“伐交”的本义应当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实力、震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而非通常所称的以外交斗争制服对手。凡此种种，不但反映了作者深厚扎实的考据功力，而且也澄清了长期以来层叠累积而形成的学术讹误，对于深化兵学文化研究大有裨益。

总之，《刀剑书写的永恒》一书，是目前军事史研究中难得的精品之作。但是，军事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较新的重要领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 肖季文)